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沈钧儒



## 一、早年留学日本

1963年元旦，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里，布满了鲜艳的一品红和常青棕榈树，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这里，全国政协举行宴会为沈钧儒老先生90岁生日祝寿。沈老坐在第一席首宾位。当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主持祝寿，并致祝辞，周总理指出：“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半年后，即同年6月11日上午3时55分，沈老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道路。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今嘉兴市）人。1875年1月2日出生于苏州。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镇江、江宁、徐州等地的知府。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做江苏候补知县客居苏州。可见沈钧儒出生成长在晚清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则是传统的文化教育，在3岁时他的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长到5岁时就进私塾受启蒙教育。13岁时回到秀水县老家应童子试，16岁考中秀才，29岁中举人。1904年参加甲辰恩科会试，中试贡士第51名，殿试二甲第78名，赐进士出身。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因此沈钧儒也就成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最后一批进士之一。

沈钧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自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用洋枪洋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时的大清帝国全没有了康熙（熙）乾隆（隆）盛世时的威风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列强瓜分的支离破碎。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地挣扎，而清朝廷则更加腐败、死气沉沉全无生机，洋人在中国肆意横行。特别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败北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民深深感到由此下去必然亡国。于是他们觉醒、他们反思、他们奋起自救。人民起义的烈火在各地燃起，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则开展了变法图强的运动。

国家的衰落，民族的危亡激起了沈钧儒极大的爱国热情。他大量地阅读康、梁有关维新变法的文章，并深受影响，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沈钧儒中进士后，本可以到京城谋取官职，从此过上安乐生活，然而为国家命运而担忧的他放弃为官，毅然东渡日本，谋求救国之道。

日本原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然而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很快强盛。1894年中日战争打败了大清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又战胜沙俄。这就使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另眼相看。认为学习欧美，不如学习日本，又由于日本距中国较近，文化前景相同，所以去日本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从1901年的280人猛增到1905年的8000人。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要想由弱变强也要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他们到日本留学，主要就是学习日本的立宪政治。1905年沈钧儒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进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学习的。在踏上日本国土时沈儒就感受到一种在中国所没有的新气息，所以他发奋努力去接受学习新的知识。在中国他已是进士了，可以说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仍不松懈，孜孜以求，有时连暑假也不休息，全力投入学习。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正规三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成绩比正科更为优异。

沈钧儒和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同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日本

的。所以学习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留学生中的各式各样人物。当时留日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清王朝对内奴役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是帝国主义的奴仆，这样极腐败的朝廷，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将其彻底推翻，代之以共和国，才是中国的出路。另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党，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瓜分，中国会有亡国的危险，因此保皇就是爱国。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使中国富强，国内一切不平等也就随之消失了。沈钧儒与两派人物都有联系。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中，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并逐渐地摒弃了陈旧的观念，用新的方式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然而沈钧儒的个人经历和所受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使他不可能接受革命的思想，而是走上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道路。

## 二、主张立宪救国

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民族处于危亡的生死关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于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衰败的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此起彼伏。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国内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震撼下，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如驻外大臣、督抚、尚书、侍郎等纷纷要求制订新的策略以挽救朝不保夕的清王朝。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政治”，表示考虑实行宪政问题。1906年五大臣考察归来上奏朝廷认为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永远保住皇位；第二，“外患渐轻”；第三，内乱也可以阻止。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同时又宣称，不可操之过急，待日后条件成熟，再参照其他国家宪法，确定立宪的具体日期和内容公布天下。由此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实在是敷衍欺骗舆论。但是它毕竟公开许下了同意立宪的诺言，对国内及留学日本的立宪派是个极大的刺激。于是各地的立宪团体纷纷建立，一时间掀起了一个立宪运动的高潮。1907年杨度和熊范舆创立宪政讲习所，目的在于宣传宪政，为今后实行法治服务。沈钧儒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为督促清廷建立民选议院，沈钧儒和熊范舆等人带头联合一百多人署名向清廷上奏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第一份要求开国会的请愿书，所以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做为倡导者之一的沈钧儒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1908年当沈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就受到朝廷密探的监视，后经多方面活动才脱离危险。然而这一小插曲并未影响沈钧儒继续从事立宪派活动。他与杨度等人一道又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改名）。由于他们在立宪活动中的影响，所以前来参加的人纷至沓来，从而使宪政公会的影响、活动、声望大大提高，再加上梁启超创办的政闻社也移到上海，很快在国内就形成了一场活跃异常的立宪运动。为了使朝廷实行真正的立宪，沈撰文《论预备立宪要旨》，他认为，立宪变法，不能不把握最主要的方面，只从枝节上谈变法，这种所谓的立宪其危害，甚至会大于不变法。

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本为形势所迫，目的在于消除革命。而现在全国各省立宪派运动声势日益壮大，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以九年筹备立宪的期限。其中第一、二年规定筹办谘议局，各省举行谘议局选举工作。谘议局是清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改良的产物，是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它的权力是讨论本省行政兴革和公债税收等，它通过的议案，只有经过该省督抚同意方能生效。如被认为有对朝廷的不恭，妨碍国家治安的，督抚就有权将其解散。所以谘议局只能提出建议供督抚采纳，不能监督地方行政，也就起不到决策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清廷专制，人民无言论自由的国家，毕竟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批评时机，进行民主宣传的合法讲坛。立宪派可以利用这个讲坛，或多或少，或主观或客观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并能给清廷的专制卖国政策以一定的牵制。沈钧儒于1908年夏回到原籍探亲，由于他在立宪活动中的影响和威望被浙江巡抚增韞留在当地筹备谘议局的工作。9月被委派为浙江谘议局筹备处总参议。1909年9月浙江

谘议局成立，沈钧儒被选为副议长。在任职期间，沈钧儒发现，有外国人在杭州宝石山，湖州武康县境内莫干山买土地建房屋。此两地都是我国内地，并不是通商口岸，而依照以往中国与欧美日本所缔结的各种条约及通商章程规定，外国人的行为，是违反条约规定，侵夺了我国人民的权力，因此不可不争。于是在浙江谘议局会上沈钧儒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案》并建议巡抚下令，对上述地区进行地界勘察，命令外国人马上停止正在进行的房地产交易。对违令者要严加查办。同时设法筹款收回已卖给外国人的土地。这项提案反映了沈钧儒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外国肆意侵占的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各省谘议局的建立，立宪派又将要求清廷召开国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立宪派认为有了立宪政体，成立了国会，就可使一些先进分子参加到政权中。从而通过国会对政府实行监督，最终达到清除封建专制的积弊，并能防止革命暴乱发生，国家由此富强起来的目的。于是立宪派在 1910 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沈钧儒以浙江谘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参加三次请愿。国会请愿代表于 1910 年 1 月上书都察院。半月后清廷以筹备并不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统一为理由，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6 月第二次请愿，此次比前一次规模大得多，入京请愿代表有 150 多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有二三十万人，然而同样又遭失败。各省代表重新协调行动，又进行第三次请愿。11 月朝廷下谕旨，将预备立宪期由原定九年改为三年，除此之处，别无他议，请愿团并没有达到速开国会的目的。请愿实际上仍然是失败的。此次沈钧儒来京数月，与各方面的人士多方面接触，认清了清廷对预备立宪并无诚意，只是一种欺骗。此时兴起于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日趋高涨的革命风潮，使沈钧儒看到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和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从立宪转向革命。

### 三、投身革命

保路运动是兴起于 20 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发动的保护路权的革命运动。近代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筑路权的获得使帝国主义一方面可以随铁路的延伸,将他们的侵略魔爪也伸到我国各地;另一方面还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华里的矿山开采权,把我国丰富的宝藏掠夺走。于是各帝国主义纷纷与清朝签约,通过筑路权的获得,在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此时清政府采取的却是媚外卖国的政策。1911 年 1 月大买办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兴办的方式把路权拱手交给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的革命思潮在不断发展,爱国主义运动持续高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以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并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清政府非常害怕。于是一方面命四川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同时从湖北火速调兵前往。就在鄂军西调不久,在湖北的武昌,革命党经过多年努力已建立较雄厚的革命基础。于是利用湖北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机会,在武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后,湖北宣布独立,成立湖北军政府。陕西、湖南先后响应。随后很多省纷纷起义宣告独立。11 月 3 日沈钧儒到巡抚院劝说增韞赞助独立,增韞不同意。4 日浙江省新军起义,5 起义成功,通电全国宣布浙江省独立。立宪派和革命派共同推举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为尽快控制浙江的局势,沈钧儒等电促汤寿潜尽快上任。沈钧儒被任命为临时警察局长,任职后沈钧儒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在浙江光复的最初几天里,一些死命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表面老实,在暗地加紧活动,私藏枪支,伺机向革命反扑。其中首要分子是原清军旗营协统贵林和他的儿子。在浙军抓获贵林父子后,沈钧儒作为警察局长及时对二人进行审讯,并根据他们的罪行判处死刑。这一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大长革命志气,人心大快,浙江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在沈钧儒任局长期间,还有一个叫梅藤根的英国人,他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他想在杭州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占一块工地作为英国侨民的居住地。此人为达到圈地的目的,特意请沈钧儒到他家作客,对沈大献殷勤,准备了丰盛饭菜茶点款待,还说了许多奉承恭维的话。为表示关系密切还请沈钧儒听他女儿弹钢琴,总之想尽办法拉拢沈钧儒。然而这一切全是徒劳的。沈钧儒不为所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湖圈地就如同在杭州又开一块租界地,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派警察在这一带严加巡视以防他人非法占入。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不受侵犯。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政权最终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这一切没有动摇沈钧儒继续革命的决心。1912 年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他任议员,并任省教育司司长。这年的 5 月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参加同盟会是沈钧儒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的一个转折

点，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进步。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民国初建、国内要求民主政治的气氛还很强烈时，袁世凯还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政治。于是他玩弄两面手段，表面上装模作样地要：“竭尽全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而在暗中加紧实行他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独裁统治，向参议院提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这一约法根本无法保护共和制度和限制袁世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希望以议会中的多数来组织“责任内阁”实现“政党政治”，从而杜绝专制和独裁的出现。于是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建立国民党。为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开始奔走各地，积极进行竞选活动。然而这对于一心要建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就在宋教仁的竞选活动获得成功时，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结果被镇压了。袁世凯为达到独裁的目的，又极力用“民主”“宪政”来粉饰自己。他纠集一些拥护者，着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所谓宪法。中国的民主、宪政遭到践踏。为了维护真正的宪政，沈钧儒和国民党的部分温和派及进步党人士于1912年10月组织民宪党，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并表示：不屈身于金钱权势，为祖国赤胆忠心，竭尽全力维护国家民主政治实行。袁世凯对限制他专权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使民宪党最终被解散了。

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梦想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列强也希望袁世凯成为他们统治中华的工具，以此扩大他们在华的利益，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称帝为条件，乘机大捞好处。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得到列强首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下令改明年为“中国民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正式登基做皇帝。袁世凯的卖国复辟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早在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专制，黄兴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沈钧儒在上海参加了这一组织。当袁称帝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举起了护国旗帜，蔡锷、康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积极响应宣布独立，并成立护国军。此时沈钧儒与国护军取得联系，协助护国军采取一致行动。1916年4月12日浙江脱离袁宣告独立，成立都督府，沈钧儒在政府里任机要秘书，参与了当时一系列军政方针的制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停止，袁世凯也由于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然而掌握北京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泛倡导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后来的国会议员会上，沈钧儒由候补议员递补为议员。此时沈钧儒正在上海为母亲服丧，在接到参议院公函时，立即打点行装赶赴广州，积极加入到护法运动中去。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为反对北洋军阀势力而奔走，不怕辛苦到福建鼓浪屿、漳州等地组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立场鲜明地表示不向军阀政府乞求和平，更不可牺牲护法原则。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一战”战胜国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北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

“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的的要求，然而这些正当的要求，却被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地加以拒绝，腐败的北洋军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愤怒，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竖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沈钧儒虽远在南京，但是新思想，新道德影响着他拿起笔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写的长篇文章《家庭新论》，在文章中，沈钧儒对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家庭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庭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从民族长远的利益考虑，每一个家庭要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因为他们是“国内唯一有希望者”，影响着国家和人类的未来，而家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又是至关重要的。为使儿童得到更完满的教育，沈钧儒呼吁全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承担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来。在文章中，他还就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改变妇女的从属和不平等的地位。沈钧儒的这本书曾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1927年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

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的旧部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分为奉、皖、直系军阀，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利，不断地进行战争，人民群众饱受战争之苦。1922年爆发了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和冯国璋打败了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此时的直系为笼络人心，愚弄舆论而恢复了国会并将国会从天津迁到北京。沈钧儒被参议院任命为秘书长。一贯主张法治强调民主思想的沈钧儒随即到北京就职，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制宪的工作中，然而沈钧儒得到的却是直系军阀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民主的丢弃。

1923年6月曹锟为达到当总统的目的就伙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用高价收买国会议员；凡出席总统预选会者给100元，选曹锟为总统每票高达500元，为了达到拉拢沈钧儒的目的，他们特别用1000元来收买。对于曹锟，吴景濂的丑行沈钧儒深恶痛绝，他愤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与其他抵制贿选的国会议员100多人联名发表宣言，揭露曹锟的行为，表明自己为民主共和而战的立场和态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经历屡次革命起义失败后正处在绝望地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先生带来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定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正式实行国共合作。1926年国共合作下的广东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北洋军阀日暮途穷。沈钧儒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这年九月他到上海，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与浙江的进步人士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用三省自治的办法反对盘踞在此地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沈钧儒的联合会工作得到三省人民支持，也招致军阀的恐惧和不安。首先对自治运动发起者进行攻击和恫吓，开列逮捕镇压黑名单。沈钧儒几次被列为攻击逮捕对象，但他毫不畏惧。12月北伐军攻占浙江，并成立临时政府，沈钧儒被任命为秘书长。他细致周密地工作，把政府的日常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浙江临时政府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机构，有共产党员宣中华、潘枫涂参加，在与他们的共同工作中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1927年春，北伐军一路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高涨，这使国内外反动阶级大为恐慌，阴谋破坏革命，他们在革命阵营内寻找新的代理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于4月12日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曾与沈钧儒亲密合作过的共产党员宣中华等人惨遭杀害。两天后沈钧儒也被捕，囚禁在省政府内。国民党浙江临时政府会议主席张静江以沈钧儒靠拢共产党思想左倾为由要求将其处死，此事引起各界的关注。蒋介石幼年老师庄崧甫，专程到南京见蒋介石说：沈乃浙江名流，有很大影响，如杀害他，将何以见故乡父老。此时蒋介石也考虑到自己刚站住脚，不易树敌过多，后电令浙江省当局释放沈钧儒等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沈钧儒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此时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时刻在鼓舞教育他。他任教务长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然而他允许进步教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劳动法，并开设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课。学校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学生，教职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沈钧儒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白色恐怖下，经常有人被捕，那时有两位学生刘著兰、余敢和教授李剑华被警察机关逮捕，沈钧儒知道后，立即挺身而出，赶到被关押地方，面对敌人，利用他的身份和做律师的口才据理力争，终于将师生保释出来，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他同样关心备至。法学院校内党的秘密组织，党支书朱剑农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工作，不幸被捕，沈钧儒想尽办法进行营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沈钧儒多次冒着危险到监狱看望他。在与共产党人接触时，他对党的了解逐步加深，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共产党人身上。

#### 四、“我是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撤入关内。仅半年时间，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同胞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的沦丧，极大地震动了世界和我国各阶层的人民。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此刻，沈钧儒怀着那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的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中旬，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抗日，结果很多学生遭逮捕。沈钧儒勇敢地站起来，向上海律师公会提议保护学生。17日当各地的5000多学生再次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死伤十余人，数十人被捕。沈钧儒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而感动，对国民党政府的卑鄙行为倍感愤怒。他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每当遇到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民政府的做法令全国人民痛心，而今在首都竟又发生拘捕学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不解……。在通电中，沈钧儒责问国民政府：东北大好河山沦丧，为什么未见惩治一位误国官员，为什么学生的爱国行为却要受到镇压？军队不去抵抗外来侵略，却把刀枪对向学生，哪里还有公理？沈钧儒的通电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国家危难之时，沈钧儒、马相伯、章炳麟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他们发宣言和通电表明自己的主张：对外，不辞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内，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尽快筹备宪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的宪法。然而这些正义的要求被国民党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使沈钧儒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的，要获得民主的权利，只有继续斗争。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率领军队违背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即震动全国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和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运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全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支援前线的捐献运动。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十九路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拼杀，展现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而南京政府惧怕日本，迫于日本的压力，在事变发生的当天，照令取消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起来的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然而，上海各界的爱国

人士并没有气馁，几天后又组织起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和李次山（当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主席，著名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上海律师公会的代表，参加了救国联合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南京政府一方面阻止国内人民抗日，一方面私下与英、法、美、日进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议和谈判。对于当局的屈辱外交，上海人民极为关注。3月18日沈钧儒和救国联合会六位代表谒晤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沈钧儒等要求郭泰祺注意两点：一、在日军未从中国领土撤出之前，不举行任何谈判；二、上海与东北系一个问题，不能局部解决。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5日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签定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同意日本军队驻留上海，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周围驻军设防，同时还允诺取缔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因此这一协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在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痛打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愤怒的民众用铜元、茶杯等物掷向郭泰祺，将其头部击伤，以表示强烈的抗议。7月，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对停战协定坚决反对，同时决定发表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王造时等起草。宣言中对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言指出：事变发生后，政府一面明着说要长期抵抗、暗中为保存小团体的实力而屈辱乞和，政府所说的长期抵抗，完全是欺骗国人的伎俩。通过这个宣言，可以看到，随着“九·一八”到“一·二八”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沈钧儒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爱国行动也使沈钧儒看到了救国的根本基础是人民群众，只有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中国才不会亡国，才会有希望。

人民要抗日，政府却不允许人民抗日，所以保障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权利，是事关重要的，人民要抗日，就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从这点出发，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保障人权的迫切意义，给予精确的阐述。并举例说，我们在此处的房屋将倾，是手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脚都被绑起了的能起来挽救呢。这些观点也正代表了沈钧儒的思想。于是在同盟成立后，沈钧儒立即参加，任上海分会的法律委员，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当时国民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将一切抗日爱国仁人志士逮捕。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这些民族精英多方行动，作为法律顾问的沈钧儒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1933年3月下旬共产党员陈庚、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谭国辅在上海被捕，除廖承志交保释放外，其余4人被押送南京。4月民权保障同盟开会组织“设法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沈钧儒与宋庆龄等7人为委员。5月他又随宋庆龄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并亲自到监狱探望陈庚等人。沈钧儒利用律师的身份，积极协助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他们的行动是向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抗议，表现出他们为维护民主民权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这就遭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极端仇恨。1933年6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寓所附近把杨杏佛杀害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因蒋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最后被迫停止活动。然而沈钧儒并没有停止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一贯主张抗日与民主不可分。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当这一权利受到践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时，作为律师给予他们支持保护是义不容辞的。这也就是为抗日救国尽力量。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所谓“新生”事件。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周刊，登载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此文章经过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是一般性叙事文章。然而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加惩处。南京国民政府唯命是从，立即通缉艾寒松，逮捕杜重远。沈钧儒以律师资格出庭为二人辩护，他凛然斥责日本侵略者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借口制造侵华事件，要求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宣判两人无罪。法庭上沈钧儒的辩护词令许多人为之感动，而国民党政府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最终将艾寒松和杜重远投入监狱。

面对艾、杜二人无辜入狱，沈钧儒义愤填膺，写下《我所我爱之国》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对祖国的高度热爱。沈钧儒之所以如此热爱祖国，其座右铭是：“我是中国人”。1935年10月著名的爱国新闻记者戈公振从苏回到上海，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弥留之际，对在身边的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重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的工作。”邹韬奋后来写了《悼戈公振先生》一文，真实动人地记下当时生动的一幕。沈钧儒被此文深深打动，边读边流泪，边哭边写成他的脍炙人口的四首五言诗：

—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

苏州有胥乃，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此时此刻胜千言万语，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亿万中国人民和沈钧儒的战斗誓言。它激励着沈钧儒投入新的救国斗争。

## 五、救国运动的旗手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三省后，1932年3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州国”，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军又进一步在华北挑起事端。1933年占领热河省，随后控制冀东，威胁平津。5月日本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在协定中，腐败到极点的国民党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占领的合法性，同时把华北的大门向豺狼打开。1935年日本又借口中国方面破坏协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等无理要求，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仍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并于7月又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妥协退让非但没有使日军有所收敛，反而助长其侵略野心。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到极点。北平的大中学校学生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要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紧要关头，1935年7、8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此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注视着时局变化，寻找救国的方法。特别是在看到中共八·一宣言后，使他们从中获得启示看到希望。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和其他几个救国会成员立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支持学生行动。为扩张影响，沈钧儒又倡导展开签名运动。于是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签字。为收集签名沈钧儒不辞辛苦地奔波。有一天，沈接到一名妇女电话。约他在一个餐厅见面，商谈签字的事。而这里宣言并未正式发表，沈钧儒的活动也是秘密的，在这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会不会是敌人设下的陷阱呢？大家为沈的安全捏着把汗。而他早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准时赴约。当从这位妇女手中得到满是签名的油印宣言时，沈钧儒被群众的热情所感动。而这位妇女也被沈钧儒这么一位老者，社会著名人士，敢于冒如此大危险，仍在干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并从此在沈钧儒的指引下，投入救国运动。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300人。由于沈钧儒善于团结人，又能很好处理各种矛盾，及高尚的爱国热情，被大家推为主席。在此前面，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有史良、陈波儿、沈兹九发起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沈钧儒、周新民等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及上海职业救国会等等，而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1936年上海各界民众在“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上一致通过建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主席。沈钧儒由于长期从事救国运动，有着丰富的

斗争经验，光明磊落，品德高尚，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自然就成为救国运动的领袖。此后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及各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沈钧儒的倡导和组织下召开了有800人参加的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大家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十九人为主席团，沈钧儒为执行主席。散会后，与会800人排成队在沈钧儒率领下，步行到庙行镇祭祀一·二八无名英雄墓。会上会下沈钧儒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游行开始时，当他从主席台向下跃时，不慎跌了一跤，旁边的人赶忙上前搀扶，而他早已站起走到队前了。从会场到无名墓大约有四五十里路，而沈钧儒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可他在游行中一直走在队伍最前列，精神饱满步伐稳健，使当时的年青人都大受鼓舞。

5月30日救国会又组织各界民众召开大会热烈纪念“五卅”，目的是进一步激发起全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群情激奋，参加者达60000人。作为会议主席的沈钧儒做了《今年纪念五卅运动意义和救国联合阵线重要性》的报告，讲话时时被群众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所打断。会后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道带领群众前往江湾公祭“五卅烈士墓”。他们四人一排，手拉着手、一路上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五卅反帝精神！”等口号。在此之后，上海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中人们都能从队伍前面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长胡子的老人，那就是沈钧儒。

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便出面主持鲁迅的悼念活动，于是委托救国会主持。鲁迅的丧事在沈钧儒的主持下进行。上海各界人士成千上万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前来吊唁。葬礼那天参加者有五六千人，沈钧儒、蔡元培、宋庆龄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一路上群众唱着挽歌，同时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走狗”、“民族解放斗争万岁”口号。在万国公墓下葬仪式上，沈钧儒在墓前怀着沉痛心情致悼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有沈钧儒亲笔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轴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缓缓下入墓坑。鲁迅的葬礼实际上成为救国会成立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此外救国会还领导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这许许多多的活动使救国会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战旗，把各界抗日救国力量聚集起来，而沈钧儒则是名副其实的旗手。在救国会里沈钧儒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常常是夜里十二点才回家。沈夫人早已去世，子女不住身边，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所以过得很充实，并不感到孤独。在救亡工作中沈钧儒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年青人的热情使他生活得更充满活力，而沈钧儒又成为年青人的领路人、恩师，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人。救国运动初期，内地青年来到上海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刚到上海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吃饭没有钱，沈钧儒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为他们吃住奔走安排，竭尽全力，为抗日救国运动充实了队伍。1936年8月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派陆瑾前往出席。可是“学联”很穷，一时拿不出一笔旅费，出国成了问题。沈钧儒得知此事后，马上从自己律师收入中拿出400元钱送

给“学联”。沈钧儒此时生活并不富裕。但为了救亡运动，他毫不吝啬。很多年以后，当陆瑾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她说：“中国的全国学联第一次派出它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她的出国路费就是从沈老那儿来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大会上讲了话，使中国学生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了世界青年的耳朵里，并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中国的进步学生运动就和世界青年的进步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就有着沈老的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的确，在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的贡献是卓越的，是救亡的先锋。爱国主义者陶行知曾写下一组诗，歌颂沈钧儒爱国主义的精神。诗题名《留别沈钧儒先生》，原诗如下：

—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头；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忘记了自己的头，  
要爱护别人的头。  
唯一念头，  
大家出头。

二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

三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大众的领头，  
他为百姓努力，  
劳苦功高像老牛。  
谁害老头，  
大众报仇

四

老头，老头！  
他是少年的领头。  
老年常与少年游。  
老年没有少年愁。  
虽是老头，  
不像老头。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曾对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时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人数不到万人。蒋介石及很多人都

认为“剿共”必胜，在这种形势下他对共产党寄予如此大的希望，可见他的远见。基于这种认识他领导的救国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前，由于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共产党的上层组织被破坏，于是许多共产党人参加到救国会中继续战斗。沈钧儒知道他们的共产党身份，仍与之密切合作，而共产党人也深深敬仰爱戴这位爱国的老人，并给予他真诚的支持。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和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政策。这个文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特地给四人答复信，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的这封信被印成油印本，在救国会内部流传。在救亡运动中沈钧儒与共产党靠得更紧密了。

## 六、“七君子”的“家长”

沈钧儒等人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然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早在救国会成立初，国民党政府就非常不安。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会上，已经开始对救国会进行攻击和诬蔑，说是少数阴谋家组织的反动团体，并要求该组织马上解散。然而沈钧儒等人并不屈服，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市长不行，委员长又跃到了前台。蒋介石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谈判，目的是只要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就可以继续存在。沈钧儒等人看出了国民党政府的用心，是要把救国会变成他们手中的工具、王牌，实际上是在扼杀广大人民群众救亡运动。沈钧儒等人坚决表示：只要你们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也就是领导救国会了。救国会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团结谁。救国会在沈钧儒的领导下顶住了国民党的威胁利诱，继续领导全国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使日本侵略者也感到不安。日本的驻沪机构领事馆，早就派特务注意监视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的活动，并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逮捕领袖人物。11月18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命令手下寺崎去找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加掩饰的要求逮捕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俞表示这些人都在监视之中只是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不可操之过急。寺崎听后大怒说：要等有证据，那就是遥遥无期的，必须立即动手抓人。并且还以正在上海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于是在日本的压力下，由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直接下命令，对救国会领袖的大逮捕行动开始了。

早在事发前一个月形势就很紧张，有很多人劝沈钧儒离开上海去躲避一下，然而他没有惧怕，冷静地说：“我不打算走，我准备被捕，什么时候拘票送到，我就什么时候上法庭去，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都得去。现在正需要像我这样的老人吃点亏，使大家可以激励一下。”其实在投身于救亡运动之初，他就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曾表示：“要参加（救国会）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

1936年11月23日2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巡捕，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陶行知家抓人。陶行知因先期出国未被抓到。沈钧儒等7个同时被捕。这天夜里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被关押在敬安寺巡捕房。此时已是深秋，60多岁的沈钧儒就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坐了一夜，他丝毫不在乎。天亮后沈钧儒等7人被押送到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由于抓人者拿不出任何犯罪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无罪释放。就在沈钧儒等被放出几个小时后又以共产党嫌疑犯为借口再次将7人逮捕。12月4日将7人解送到吴县（今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起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冤案——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他们被捕的罪名就是爱国。“抗日非法”、“爱国有罪”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逻辑。沈钧儒和他的战友们，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沈钧儒等人虽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沉沦和气馁，也没有放弃斗争。就在他们由上海被押解苏州的汽车上，透过玻璃窗看到祖国的山、祖国的水、祖国的一草一木，祖国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心情难以平静，决不

能让祖国大好河山落入日寇铁蹄之下，更增加了同妥协退让卖国的政府斗争的决心。于是车厢里没有叹气声，有的是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在被关押日子里，他们还成立了临时组织。在七人中以年纪而论，沈钧儒居长，且年高德劭。大家一致推他为“家长”。为什么称“家长”呢？邹韬奋说：“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还有他们推沈钧儒为“家长”的原因是沈先生对他们这班“难兄难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就如同慈父一样，使人体验到温暖。在沈钧儒这个“家长”领导下，他们六个人如一个人（史良在女监）同甘共苦。既然六个人一起被捕，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还要求关在一起，如果当局要把六个人分开，大家就以绝食来抗议。在谈到绝食时，大家认为沈老年纪大了可以除外。但沈钧儒无论如何不肯，他说“六个人是一人”，果有实行绝食抵抗必要的话，他必须一同加入。虽然绝食后来没有实行，但是沈钧儒大无畏的精神令大家深为感动。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压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自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放弃东三省，调到西北和西北军杨虎城一起攻打红军。国难当头不打日本反而打红军，这使张、杨深感到前途的渺茫，同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深深打动了他们。就在蒋介石亲抵西安进行“剿共”督战时，张、杨扣压了蒋介石，强迫其抗日。事件发生后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加之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救国会的相同，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就迁怒于七君子，有人要枪杀沈钧儒等人，借以警告张学良、杨虎城。苏州看守所形势一下子紧张了。增加了岗哨，限制他们的活动，不允许探望。沈钧儒等人分析形势，认为在混乱情况下，很可能有意外牺牲发生，然而他们并不惧怕牺牲，表示：如果被枪毙，也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然而对沈钧儒等7人仍坚持他们的行动是“危害民国”的老调子，继续关押。同时他们又大搞劝降活动，让杜月笙等人前去劝降，提出只要沈钧儒等保证不再从事救国活动，留京或去国外就可获得自由。而沈钧儒等人坚决抵制，认为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事大，宁可不出狱，也决不丧失原则立场和有损国格。碰了一鼻子灰后国民党政府又使出新的花招，对沈钧儒7人提起公诉。为了壮大力量使更多人认识国民党真面目，也为了便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合法斗争，沈钧儒等人商定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每一个被告可以请律师3人作为辩护人，于是他们7人共请了21位律师，其中大都是社会上极有威望的知名人士。如此之多的著名律师出庭辩护，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空前的。

1937年6月11日开庭，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首先受审。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理直气壮地说：“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又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安详而机智地回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

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沈以幽默的口吻答道：“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沈钧儒大义凛然，一身正气。

就在沈钧儒七君子因“爱国罪”而被捕后，全国各界人民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释放他们并宣布无罪。救国会首先在11月24日和27日的《紧急宣言》《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中严正指出：将救国会领袖无辜加以逮捕，实在是一种对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在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绥远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种客观上助长敌人势力的行动。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中国共产党《红色中华》报也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爱国者的迫害。6月25日，就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了名震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发表宣言说：“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庭，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也爱国，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一起坐牢。”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学教授、学生、职员、工商界人士、知名演员等等都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给国民党政府致命的一击，使其狼狈不堪。

由于沈钧儒等七人坚定的爱国立场及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营救，加之“七·七”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37年7月31日，被关押了7个月零27天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同时出狱。下午2点沈钧儒等七人走出监狱大门，门外几百名民众已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等着迎接他们，此情此景令七君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沈钧儒代表大家对各报记者说：“当不改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国民党政府直到1939年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救国无罪最终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结论。

## 七、坚持团结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距北平城西南十多公里处的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在演习将结束时，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早有准备的日军竟向宛平城开枪，炮轰芦沟桥，忍无可忍的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芦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又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此刻沈钧儒等正在狱中，在闻讯后，立即联名致电芦沟桥二十九路军将士，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同时汇款慰问流血牺牲的将士。7月底，沈钧儒等出狱后未及调养身体，就马上投入领导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心，他写《决念》一文，为自己规定目标和行动准则：

一、爱世界，爱祖国，爱和平，痛恨战争，对世界一切侵略行径都坚决反对。

二、坚决拥护抗日救国战争。

三、对抗战中一切妥协、投降行动理论坚决反对。

四、对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五、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工作，决不有半点私心。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要求国民党政府开展全国民主爱国运动，实行全民族抗战。八月十三日，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八·一三”事变后，全中国进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9月下旬，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编红军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日还比较积极，先后组织了湘沪会战，徐州、太原、武汉等大会战。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的是片面抗战路线，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单纯由政府 and 军队进行的抗战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放手发动全国的人民群众，打一场全民战争。沈钧儒和救国会成员与中共主张相一致。围绕着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抗战的全面开展，国民党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国防参议会，以便听取非政府方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聘请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等25人为该委员会的参议员。沈钧儒在国防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两个议案，建议组织一切财力物力人力，积极协助政府军作战，发动游击战争；同时为更好“组织全国整个民众之伟大力量，以巩固后方，增加抗战实力”他要求建立农村组织，训练民众，投入战斗。

湘沪会战后，日军向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扑来，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在汉口，他创办了《全民周刊》，自任社长，发表了以《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为题的发刊词。

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邹韬奋等任编委，邹韬奋为主编。由于该刊物思想性、艺术性强，每期销售量达30万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前方战事越来越紧，抗日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不怕流血牺牲，这些都深深打动着沈钧儒。为了表达对抗日将士们的敬仰之情，他两次率慰问团赴抗日前线，看望慰劳那些为民族利益不

畏牺牲、浴血奋战的祖国儿女们。1938年8月，南方正是酷热时节，加之年事已高，很多人劝阻沈钧儒不要亲自去前线，而沈钧儒却微笑说：“我身体还健康，跑路也跑得，至于路上的辛苦，饮食的不方便，当然是难免的，但吃这一点苦，比之前方的将士来，就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只要一想到英勇的战士在这样的烈日下还要艰苦作战，也就不觉得苦了。”就这样，沈钧儒和慰问团里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了去往前线的道路。慰问团直达江西瑞昌的一个小镇，此处距前线仅二三十里，最近的地方仅8里地，可以清晰地听见隆隆的炮声。日军飞机更是经常出现，很是危险，然而他毫不在意，仍坚持到将士们当中去慰问，给他们带来后方人民的感谢之情和问候，给战斗在前线的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在前线，沈钧儒看到，由于担架不足，很多伤员不能及时得到救护而牺牲，十分痛心。回到武汉后，他立即向各界民众发出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在他的带动下，各界民众纷纷起来组成担架队，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为前线服务，为抗战出力。沈钧儒从前线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又和邹韬奋、王炳南、范长江等再赴前线，第二次去慰问那里的将士。

从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中共摒弃前嫌，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这些都加深了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认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于是积极帮助有志青年到延安去，投身到抗日前线。对他们的选择，沈钧儒给予热切的赞扬和包括物质的支持，他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叶剑英、秦邦宪联系，为他们筹集必要的经费，沈钧儒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卖掉衣服。就这样，无数热血青年经沈钧儒的介绍和帮助，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为我们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抗战期间，沈钧儒与共产党的联系非常密切。1938年在武汉，1939年以后在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重要领导都与沈钧儒有直接联系。由于这些以及沈钧儒和抗日救国会在抗日救亡的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党的意见极为一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和抗日救国会肆意诽谤，沈钧儒对此置之不理，有人说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坚决地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对华战争策略，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寇的引诱下，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1941年1月，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把枪口对向顽强抗战的新四军，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在这关键时刻，沈钧儒立场坚定，带领救国会的几名参政员站在共产党一边也拒绝出席参政会以表示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行径的抗议。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在1942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参政员全部被除名。

作为一名律师，沈钧儒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他受聘为中共抗日时期的重要报刊《新华日报》的常年法律顾问，用他的法律业务知识为广大民众服务。1941年3月，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勱等组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本来是创始人之一，但由于一些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

切，担心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又怕他不能向共产党保密，就没有让他参加，直到1942年，才正式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也成为盟内政治派别之一。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沈钧儒一贯注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抗战爆发之初，他积极督促国民党政府改革政治，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彻底改革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沈钧儒认为政治民主化，使人民能享有充分民主自由权利，是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组织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是国防议会的继承和发展，有参政员200多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被聘为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沈钧儒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个提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破坏法制的行为进行揭露，同时提出补救办法，这项提案得到很多参政员的赞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等以及其他参政员40多人签名赞成，这个提案在临时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并通令全国实行。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

武汉失守后，1941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取消了抗战开始后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同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救国会、共产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党派的参政员发起了一场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在这次会上，沈钧儒再次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权案》，发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呼吁，同时强调，宪政运动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取得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宪政运动，沈钧儒在11月初前往桂林进行演说宣传，并且表示：“从民国元年前我就参加宪政运动，直到现在宪政一天不完成，我就还是宪政的积极分子。”

1943年12月21日，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上海法学院师生举行了盛大茶会，祝贺沈钧儒七十大寿，人们怀着对他的崇敬心情出席这一庆祝活动。祝寿会由陶行知主持，在他的祝辞里，将沈钧儒自“九·一八”，特别是1935年领导救国会运动以来的政治主张，做了高度概括：“沈先生毕生的奋斗、主张、生活，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有三项，一、抗战，二、团结，三、民主。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便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坚决主张团结，为了要使团结巩固，坚持主张实行民主，这就是沈先生的救国主张。”的确，沈钧儒在八年抗战中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报告，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要求是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年冬天，在沈钧儒的领导和主持下，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鉴于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救国会的使命结束，将其改成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出：中国人民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外来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余

势力的压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当前的任务是消除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由此可以看出，沈钧儒和救国会的主张与中共主张完全一致，这表明他完全接受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并赞成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加紧内战准备，国统区的人民掀起反内战运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是反内战、争民主的重要阵地。1945年12月1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争民主活动，结果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的镇压，他们殴打学生，并向学生聚集处投手榴弹，制造了“一二一”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沈钧儒抑制不住愤慨的情绪，写就一首题为《献给生者和死者》的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暴行：

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  
座谈谁有罪，飞祸竟从天。  
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宝篇。  
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

## 八、反对内战，拥抱新中国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派军队进攻解放区，结果都以惨败告终，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这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沈钧儒作为民主同盟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与中共密切合作，相互配合，经过各民主党派及进步力量努力，会议通过有利于人民，而不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改组，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议案。沈钧儒等人的正义行动，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大会于2月10日闭幕，就在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突然被一群国民党特务暴徒所捣乱，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数十人被打伤。沈钧儒自然成为特务们攻击的对象，特务见到他时叫嚣“打死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学范的汽车经过，沈钧儒跳上汽车，方脱离险境。事后他没有躲避而是亲自到医院慰问受伤的朋友，使大家信心倍增。根据政协安排，他到上海工作。就在到沪当天他便向新闻界披露较场口惨案真相，批判蒋介石的无耻行径。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也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和上海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6月上海10万群众举行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雷洁琼等10人前往南京请愿。当代表来到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毒打，时间长达4小时之久。事发后沈钧儒和救国会的陶行知、史良等人致电被打志士：“先生等为和平奔走，竟遭毒手，全国人民同声愤慨，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个接一个惨案的发生，令沈钧儒愤怒至极，他写道：“杀一二人而欲天下再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同时也使他越来越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并在11月悍然召开伪国民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只有极少数民社盟员违反盟约参加伪“国大”。民盟立刻宣布将这些人开除出籍。沈钧儒和民盟为维护民主进行积极工作，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使之停止公开活动。同时对沈钧儒进行恐吓和施加压力，逼其屈服。沈钧儒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工作，然而要离开决非易事。特别是他的胡子很是显眼，为了能到香港开展工作，他宁愿牺牲心爱的胡子。后来经过周密的部署，他乔装重病人，戴个帽子，又戴个大口罩把胡子掩盖起来，由护送的同志搀扶从容上船。到香港后他逢人就会轻轻捻抚斑白的美髯，微笑着说：“这胡子还是保存下来了。”言语间表露出一种决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者的神态。

到香港后沈钧儒和章伯钧马上着手恢复民盟工作并于1948年1月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会议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并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此次大会是民盟与美蒋反动派彻底决裂，从“中间路线”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为民盟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29日沈钧儒和章伯钧等在中共驻香港代表潘汉年帮助下，乘船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从四面八

方汇聚北平，筹备新中国成立各项事宜。2月25日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到达北平。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到车站迎接。此刻车站鼓乐喧天，群情激昂，这时只见有几个年轻人异常兴奋簇拥而上，将最受人们敬仰的两位老先生抬起来，一位是郭沫若，一位就是沈钧儒。被抬得高高的沈老如神话中的南山老寿星，这时人们看到在他眼中闪着激动的泪花。是的，经历过晚清、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终于看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怎么不令他兴奋令他高兴呢？

6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9月下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并被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站立起来。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终于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怎么不令他激动，此时沈钧儒已是70岁的老人了。然而，他确感到自己像青年人一样充满活力，他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解放初期他对于建立人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很大贡献。1954年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当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他非常高兴：“宪法，真正人民的宪法，决不是容易得来。”“我从前清以来，就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这更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同时也希望能成为共产党一分子，1957年他郑重写信给董必武表示要求入党的愿望。1962年9月他再次提出入党请求。他说：“我身体精力已不如前，常常乏力，举步沉重，为了身后事，与你们说说，说明我的愿望。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在接到沈钧儒的申请后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已具备入党条件。同时又考虑到他作为党外的共产主义者，鼓励团结广大党外朋友，就更有特殊的意义，其作用远比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还要大。于是以民主人士中的左派旗帜肯定沈钧儒的重大贡献。

沈钧儒一生嗜石成癖，在他的书斋里除图书外，还有几个书架陈列着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石头。他对石头的喜爱程度，他儿子曾写道：“父亲对于石头喜爱程度，几乎跟对待自己的儿女差不多，每得到一块新的石头，一定要把它放在水里，亲自用刷子来洗濯，一洗再洗，把粘附在上面的污泥都洗掉，露出石头的本来面目。养在盆里的石子，他每天要替它换水。书桌上放着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他常常亲自拿了一把水匙把清水慢慢地浇在上面，工作之外，一有闲暇的时间，就摩挲玩弄，乐此不倦。”抗日战争时期，沈钧儒曾为他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沈对石头的喜爱，实际是他一生刚正的写照。

1963年6月11日凌晨3时55分，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出席追悼会，董必武在致悼词中指出：“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